

14日，叙利亚问题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员会会议在约旦亚喀巴举行，美国、土耳其和欧盟的代表也于当天在亚喀巴会晤。会后发表的声明强调，支持包容和平的叙政治过渡进程，为叙人民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同时，阿盟也通

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叙以军事缓冲区和邻近地区的军事行动，要求以撤出叙被占领土。

不难看出，叙利亚变局已对中东原有格局带来巨大冲击，而外部世界还需时间来评估叙利亚新政府的执政理念、政治实践和

对外政策走向，从而制定应变之策。一些地区国家对以色列趁乱对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大为震惊，这也为未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改善前景带来巨大疑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从“群雄逐鹿”到“三足鼎立”：叙利亚反对派的复杂演进

文 / 李海鹏

自2020年3月俄罗斯、土耳其就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停火问题达成协议，直至2024年11月27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突然向政府军发动进攻，叙境内形成了三支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对峙的政治军事力量，即“沙姆解放组织”“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叙利亚国民军”。这三支力量的发展历程、相互关系及其外部支持力量的演变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叙利亚内战轨迹，也将对“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沙姆解放组织”的“另类”演进

自其前身“努斯拉阵线”于2012年1月宣告成立后，历经“征服沙姆阵线”（2016年7月）和“沙姆解放组织”（2017年1月）两阶段的整合重组，直至2024年11月27日发动“威慑侵略”行动，“沙姆解放组织”（“沙解组织”）已发展为叙境内最强大

的武装反对派。但与其前身及其他活跃在叙的“圣战”萨拉菲主义团体相比，“沙解组织”在12年间已经历了深刻转型。

首先是本土化转向，即由全球“圣战”组织转型为聚焦本土的叙利亚反对派团体。自2012年“努斯拉阵线”建立伊始，该组织领导人朱拉尼就寻求与叙境内其他反政府武装，尤其是伊斯兰主义和萨拉菲主义团体建立合作关系，并尝试融入本地社会。在合作之外，“努斯拉阵线”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也存在竞争关系。2014年，前者开始打击受美国扶植的世俗民族主义反对派团体，成功瓦解或强行吸收了部分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朱拉尼在2013年、2016年逐步完成了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全球“圣战”组织的主动切割，并在2017年后对其控制区内新成立的“基地”组织长期严密控制。

其次是温和化转向，即从激进“圣战”萨拉菲主义团体转型

为务实、保守的政治萨拉菲主义武装团体。宗教实践方面，“沙解组织”从更宽泛的行政管理，而非宗教文本角度理解教法的实施，对非萨拉菲主义的传统教法学派持相对宽容立场。公共外交方面，2015年起，朱拉尼开始在新闻发布会上广泛使用“革命”一词，通过宗教学者将“革命”话语的使用合法化，有意将其组织塑造为“革命”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2013~2016年，朱拉尼借助半岛电视台向阿拉伯和西方公众阐述“沙解组织”的本土化使命及其关于伊斯兰教法、未来国家职能的理解和愿景。2021年起，朱拉尼开始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有意淡化该组织早期宣传中的激进成分。

第三重转向是对其控制区域从粗放型军事管理向实施中央化、制度化治理的转变。2015年3月，“努斯拉阵线”及其盟友占领伊德利卜省，至2017年6月已控制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

西部大片土地。2017年起,“沙解组织”的准国家构建进程明显加速,于同年12月组建了包含十个部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同期,朱拉尼也开始花费更多时间出席与社会经济治理相关的活动,公开表示“自由来自军事实力……尊严来自经济和投资项目,借此人民和公民才能过上符合穆斯林尊严的生活”,同时承诺让当地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对外关系上,早在2012年12月“努斯拉阵线”就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但伴随叙国内形势变化及“沙解组织”表现出的本土化、温和化趋势,至少自特朗普首次执政时期起美国政府便已开始通过秘密渠道与该组织接触,2018年8月之后则停止了针对朱拉尼个人的军事打击。“沙解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则更加暧昧不清。土对“沙解组织”早期“圣战主义”意识形态有所疑忌,但在打击阿勒颇地区库尔德势力方面又需要后者的合作。而“沙解组织”则试图保持在其控制区内行动的独立性,且在伊德利卜省面临土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竞争,但在军事和民用物资补给方面又严重依赖叙土边境的过境点。最终双方达成某种看似矛盾的务实合作:“沙解组织”参与支持土对库尔德力量的军事行动,2017年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在叙西北部建立冲突降级区之后,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沙解

组织”的保护者,但又在2018年8月宣布后者为“恐怖组织”。

“叙利亚民主力量”:顺势而为,还是过度扩张?

当前,“叙利亚民主力量”(又译“叙利亚民主军”)主要军事力量由“库尔德民主联盟”(“库民盟”)下属民兵组织“人民保卫部队”组成。2003年建立的亲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库工党)的“库民盟”,在土叙关系紧张时期(即1980~1998年)曾长期受到阿萨德政府的庇护。在2011年前,诸多库尔德政党皆未积极主张独立建国,也并未与阿萨德政权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然而,2011年3月叙内战爆发,次年6月叙政府军开始撤出东北部库尔德地区,同期叙国内库尔德政治力量发生分化重组。2011年10月,亲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党派宣布成立“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呼吁结束阿萨德政权并赋予库尔德地区自治地位,寻求通过外交手段实现该目标,与反对派平台“叙利亚全国联盟”保持合作。“库民盟”及其盟友则同时拒绝与阿萨德政府和亲土的反对派合作,并于2013年11月宣布准备在叙北部部分区域组建临时政府并举行选举。2012~2014年,“库民盟”成功确立了自身在叙东北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主导地位。

2014年6月起,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迅速崛起。同年9月,

“伊斯兰国”为夺取叙北部边境城市科巴尼而发动攻城战后,美国决定选择叙库尔德人作为其在叙境内主要盟友,这进一步巩固了“库民盟”在叙东北部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合法性。2015年10月,美国推动“库民盟”联合叙东北部地区其他族裔、教派主导的反对派力量,成立“叙利亚民主力量”(“民主力量”)。2016年5月,“民主力量”对叙东北部阿勒颇省军事重镇曼比季发动攻势,其试图建立的横贯叙北部的“罗贾瓦—北部叙利亚民主联邦”几乎成为现实,但最终触发土耳其激烈反弹。2016年8月和2018年1月,土在叙境内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叙北部建立缓冲带,并直接控制了阿夫林地区。尽管建立联邦设想落空,“民主力量”还是在2018年7月建立“叙利亚东北部自治当局”,试图统合其控制下的不同委员会和行政机构。2019年10月,土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在叙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增设了一个缓冲带,从东西两方向对科巴尼构成合围之势。自此“民主力量”控制区始终处于土军事威胁阴影之下。

在叙各派政治力量中,“民主力量”名义上走“第三条道路”,实则整体执行亲阿萨德政府、敌视反对派的政策。在对叙政府关系上,“民主力量”在短期内可与之默契合作,但长期而



露了美国政府内部在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拜登政府虽仍将“民主力量”作为美国在叙境内最重要的盟友，但二者合作性质已从狭隘的反恐任务转变为在叙利亚和地区问题上更广泛的合作。美国在处理与“民主力量”关系上的顾虑，很大程度上缘于其重要盟友土耳其对叙库尔德问题的高度敏感。土政府多次宣布“人民保卫部队”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存在是土的“红线”。2015年10月，埃尔多安明确表示不会容忍在叙东北部出现像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那样的库尔德自治区域。

言二者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2012年叙政府主动撤军并默许“人民保卫部队”填补叙东北部地区军事真空，叙内战期间二者间从未发生大规模冲突，在抵制土耳其向叙北部地区（如曼比季）推进方面也表现出一定默契；另一方面，叙政府拒绝接受库尔德人自治，“民主力量”也一直抵制叙政府在东北部地区的残余影响。更重要的是，亲土的叙反对派对二者而言都是更大的敌人。对“民主力量”而言，2012年叙政府撤军后，叙反对派各派系就威胁要“接管”库尔德地区，但遭遇“人民保卫部队”的武装抵制。由于其领土野心覆盖了叙北部大片阿拉伯人占人口主体的地区，“库民盟”多次与

拉卡省、阿勒颇省和哈塞克省的反对派武装发生冲突。类似冲突在土整合叙反对派武装并将之纳入2016~2019年其在叙三次军事行动后则愈演愈烈。

在与外部力量关系中，美国 and 土耳其的介入决定性地影响了“民主力量”的命运。美国与叙库尔德力量间伙伴关系的建立具有一定偶然性。尽管作为军事盟友，“民主力量”在配合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表现出众，但白宫和美国国会内部围绕美国与“民主力量”合作的性质和方式始终存在争论。奥巴马政府最初将这一伙伴关系定性为以反恐为核心的临时合作；2018年12月，特朗普突然宣布从叙撤军及其后的“出尔反尔”，集中暴

2016~2019年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充分证明“破坏他们想要从（叙利亚）东部到地中海建立的‘恐怖走廊’”已成为土政府对叙政策的首要关切。

“叙利亚国民军”：代理归一与化零为整

与“沙解组织”和“民主力量”相比，“叙利亚国民军”的构成、外部支持者变动都更为复杂。2012年叙转入全面内战后，叙国内反对派力量经历快速分化重组，世俗民族主义和温和伊斯兰主义——以隶属于“叙利亚自由军”的各反对派团体为代表——影响力下降，激进伊斯兰

主义反对派乃至“圣战”团体则迅速崛起。在支持反对派的地区国家中，沙特、卡塔尔分别主要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和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土耳其与两大阵营反对派团体都保持合作。2013年6月起，美国正式开始武装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代表的反对派武装。

2014~2016年是叙反对派武装进一步整合重组的关键阶段。随着2014年“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将其在叙境内重点合作伙伴转向库尔德武装，并于2017年7月终止了对“叙利亚自由军”的武器、训练和后勤支持。2015年9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内战后，沙特、卡塔尔大幅减少了对叙内战的干预。因而自2015年起，土耳其成为“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主义反对派最主要的支持者，但其战略重心已从推翻阿萨德政权转向遏制叙库尔德势力、防止难民大量涌入土。在叙北部地区，2016年8月土发起的“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大大强化了“叙利亚自由军”与土的伙伴关系。至2017年6月，土已将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重组为三个军团，助其建立了更清晰的指挥和控制结构，同年12月将之整合为“叙利亚国民军”（“国民军”）。在伊德利卜省，部分参与“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武装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愿加入“国民军”，同时又抵制“沙解组织”对其的

武力整合。2018年5月，上述团体在土方努力下被整合为“民族解放阵线”，后者最终在2019年10月被并入“国民军”。

截至2020年，“国民军”已发展为由41个作战单位（师或旅）组成、拥有七至九万名成员的军事力量。但与“沙解组织”相比，“国民军”始终未建成为一支有凝聚力、组织结构集中化的军事力量，其包含的不同分支常陷入相互冲突。在对内关系上，虽然与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与“沙解组织”在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持续发生冲突，但2020~2024年“国民军”大部分军事行动针对的都是“民主力量”。这一点也与其主要支持者土耳其的战略关切相一致。

内外联动下叙利亚政治过渡前景

在此次以“沙解组织”为首的反对派武装发动“威慑侵略”行动，并迅速向首都大马士革推进的同时，“民主力量”也开始向叙政府军阵地挺进，“国民军”则于2024年11月30日对“民主力量”和叙政府军同时发动代号为“自由黎明”的军事行动，各方陷入“乱战”。12月10日，在以穆罕默德·巴希尔为看守总理的叙过渡政府顺利接管权力的表象之下，叙三大反对派势力将面临相互关联的三大议题，这些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相关团体间的力量平衡乃至

叙政治过渡的命运。

第一个议题即如何实现平稳的政治过渡。12月14日，叙利亚问题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员会会议在约旦亚喀巴举行，美、土及部分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政府发布联合声明，明确要求叙各方“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通过透明程序建立包容、有代表性、非教派主义的政府”。但建立包容性政府恰恰是叙国内相关各方面面临的一大挑战：一方面，不同派别间意识形态分歧严重；另一方面，经历长期内战和原始“国家构建”后，不同派别的党、政、军与领导人个体间权限常模糊不清，且各自都建立起了庞大的庇护网络。当前叙看守政府总理和11个部长全部来自“沙解组织”或“叙利亚救国政府”，过渡期后新政府内职位和资源的分配——若秉承包容性原则——必然要经历不同派别间的激烈争夺。平稳的政治过渡还要求各方尽快就解除民兵武装的安排达成一致，并逐步以和平时期的正常经济生活取代战争经济。目前，朱拉尼已开始就组建国防部事宜与不同反对派武装展开对话，但“民主力量”等团体是否愿意解除武装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恢复正常经济活动也将使叙在短期内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可以说，上述实现平稳政治过渡的条件无疑都需要外部力量（美、土、海湾国家等）的协调参与，但各国在叙问题上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

2024年12月14日，叙利亚问题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员会会议在约旦亚喀巴举行。会后声明强调支持包容和平的叙政治过渡进程，为叙人民提供人道主义帮助。



供图/IC photo

亚领土问题。由于直接涉及国家主权和政府合法性，“沙解组织”或过渡期后的叙新政府迟早要就这一问题与土耳其摊牌。对当前的叙政府而言，其可能选择——但效果难以保证——的选项包括通过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边机构对土施压。其他软性手段还包括收编“民主力量”，打压“库民盟”并切断其与库工党联系，最终通过强化对库尔德地区控制说服土撤

其次是叙库尔德地区地位问题。这一问题对内关系到叙国体政体、国家身份认同，对外牵涉到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民主力量”和“国民军”（及其背后的土耳其）在这一议题上将继续尖锐对立。对“国民军”和土而言，其在库尔德地区的目标包括：压缩“民主力量”所控领土，扩大土“缓冲区”范围；否决一切赋予库尔德人自治地位的制度设计，尽可能建立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直接控制；打压亲库工党的“库民盟”。从目前的军事态势来看，在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后，“国民军”有可能配合土军队对科巴尼发动攻势，从而帮助土方在叙北部地区建立连续的“缓冲区”。此外，考虑到库尔德人内部的党派分歧，及当前幼发拉底河以东阿拉伯人要求摆脱“民主力量”控制的抗议活

动，“国民军”和土政府还可能支持“库民盟”竞争对手加入叙新政府，并鼓动阿拉伯人抵制其对阿拉伯人口聚居区的控制。与之相对，“民主力量”的短期目标在于尽可能保持对现有领土和资源的控制，同时追求建立联邦制或尽可能多的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主权。但其可能的政策选项却相对有限，其一是寻求与立场相对独立的“沙解组织”政府合作，利用“民族解放阵线”与“国民军”的分歧；其二是和美国打“反恐牌”，即以关押在“民主力量”监狱中的大量“伊斯兰国”囚犯为杠杆，迫使美国维系对其支持。鉴于“沙解组织”的孤立地位及特朗普在12月7日不愿美国卷入叙事务中的表态，未来“民主力量”的处境相当不明朗。

第三个重要议题是土占叙利

军。土政府则可诉诸多个选项，如以“反恐”为借口拒绝撤军；仿照“南黎巴嫩军”模式，在叙北部建立稳固的安全区后撤军，并通过少量军事顾问和“国民军”维持对安全区控制；撤军后保留随时军事介入打击库尔德人的权利；甚至通过支持“国民军”、特别是其中的穆兄会力量组建亲土政府，将该问题“冻结”起来。

综上，美国和土耳其将成为影响叙未来政治过渡进程的关键外部力量。土及“国民军”两者与“民主力量”间的矛盾将成为这一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沙解组织”将成为影响两方力量对比的关键国内因素。相对土耳其，美国拥有影响“沙解组织”的更多筹码，尤其考虑到后者的相对孤立地位。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